

中国农民工

魏城 编著

Zhongguo
Nongmingong
Diaocha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中国农民工调查

ZHONGGUO NONGMINGONG DIAOCHA

魏城

编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工调查/魏城编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036-7899-8

I. 中… II. 魏… III. 农民—劳动就业—调查报告—中国 IV.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3257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中国农民工调查
魏城 编著

编辑统筹 大众法律出版社

策划编辑 韩满春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JOYAL.CN 周主芝

本书中个别图片未能联系到作者,请其
和法律出版社联系,领取稿酬。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陶松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74千

版本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网址/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苏州公司/0512-65193110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036-7899-8

定价:2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言

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

我父亲来自中国山东胶东农村。他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去县城一家杂货铺打工,他虽然19岁就弃工从戎,他虽然一辈子是个军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种地,工作之余,他在自家后院开拓了一块儿地,种瓜种菜,其乐无穷。后来离休,他索性成了“专业农民”:全天候种地,一直种到前些年干不动活为止。

父亲与土地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他经常回农村老家探亲,并且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人回去: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是“忆苦思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是“寻根”。我们老家确实很贫苦,爷爷、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个孩子,但死了7个,只有一半活了下来。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自然少不了与姑姑姑父盘腿坐在农村土炕上吃海蛎子、与表兄表弟在海边钓鱼这类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则是听姑姑哭诉丧子丧女之痛、听姑父叹气没钱给结婚的儿子盖房、听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这类伤心之事。

后来,我知道,老家清末明初闹灾荒,有很多人“闯关东”,后来定居在东北。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城市的“城里人”。我回老家时,常常会看到这些东北“城里人”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提着大包小裹,坐着长途汽车,回胶东老家寻根探亲,一旦来到乡下,他们特别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务农的乡里乡亲们的尊崇和款待。

我没有赶上当时的“上山下乡”,但小学时,我们经常被学校组织

集体去农村,帮助农民捡麦穗;中学时,我们除了每年夏收帮助农民割麦子之外,还曾全班一起去农村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住,白天则跟农民一起干农活,美其名曰“学农”。那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废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漠不关心,以及年轻一代渴望离开农村的梦想。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年兵。我的战友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被领导抓公差,我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们的呼吸哈欠呼噜饱嗝。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已经恢复了高考,但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的仍属凤毛麟角,当兵大概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可行之路。这些农家子弟兵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部队提干,顺着军官的阶梯往上爬;即使无法提干,也要争取入党,这样他们也许能够在复员后被安排进入城镇工矿企业内就业,转为非农户口;如果既无法提干,又未能入党,他们就只能重返农村务农,那他们在部队的这一圈就算白转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刚入伍的农村兵,为了争取早晨第一个抢到扫地的扫帚,为了给班长留下好印象,在起床号吹响前十分钟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军装,再躺进被窝里,起床号一响,便马上箭一般地窜起,直奔放置扫帚的墙角……

李明(化名)是我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来自河南农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李明父亲赶上了少有的城市企业去农村招工的机会,成了洛阳一家工厂的工人,但父亲无力使老婆孩子都转为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能在农村老家务农。李明在家中是老小,当兵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他聪明能干,在报务员教导队集训时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训结束前,他又被评为唯一的“优秀学员”,那时他对自己在部队里入党、提干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训结束后,我们被分到不同的部队,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李明表现非常突出,不论是发报还是收报,他一直都是技术标兵。谁知,就在我们集训结束一年之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不再从普通战士中提拔军官,而从军校中培养军官,军校则与地

方普通院校一样,面向社会招生,通过文化考试录取学员。这样,那些本来就升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试图通过当兵跳出农门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极,李明决定复员。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李明给我的来信中所流露的那种灰色的情绪。

那时中国的企业还时兴“顶替制度”。李明复员后,他父亲不想让家中最后一个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决定提前退休,让儿子进厂“顶替”。这样,李明父亲以自己提前回乡作为代价,让小儿子实现了进城当工人、户口农转非的梦想。

1980年,我也复员,并在同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中,也包括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学习最刻苦,待人最诚恳,成绩也最优异。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叫赵启祥(化名),来自安徽农村。小赵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学期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课,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睡觉,虽然考试科科都及格,但成绩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特意强调不记考勤,学生可来可不来,但每次小赵都来,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觉。同学们戏谑地说,小赵需要老师那种催眠式的讲课声,才能睡得着觉。

他上课睡觉时,偶尔会发出浅浅的呼噜声,坐在他附近的同学可能会相互会心一笑,但不会报告老师。但有一次,他的鼾声可能过响,终于被老师听到,老师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几声,他才醒了过来,在同学的一片笑声中,他揉了揉眼,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他上课时依然故我,继续躲在教室角落睡觉,但大概因为明显改善了睡觉时的呼吸方式吧,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鼾声。

后来,我们发现,小赵绝对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课时睡觉,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课程,自读许多课外书,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毕业时,别人都忙着活动管分配的辅导员,力争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却凭着夜晚自修的专业课知识和英语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又以很好的专业成绩和很高的托福分数,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并赋予全额奖学金。

小赵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第一个出国留学,并第一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谈起他,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赵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最有远见,但也最会伪装的人,他的野心和远见都伪装在白天上课时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正好赶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出新、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的时刻,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农民比市民“牛”的时期。

就在那个奇特的“城乡倒挂”期,有一次,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因经营鱼虾养殖业赚了钱,受到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一气之下,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山东胶东的牟平县,一直开到北京告状,他的举动打动了诸多中央级传媒的记者,于是,一批京城记者,其中也包括我,坐着这位山东农民的面包车,又浩浩荡荡地开回了山东牟平。

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牟平采访时,为当地农民的富裕、自信、牛气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贫穷衰败的胶东老家!这位与地方政府打官司的农民,仅仅靠养殖业和副业,就盖在了我们这些京城记者看来属于“富丽堂皇级”的小楼,买了当时城里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数辆汽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当时胶东那一带的农村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真正富裕的,还要数那些经营乡镇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罕见的“城乡倒挂”期,比当时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脑体倒挂”期还要短暂。至于中国农民为何由相对富裕转为相对贫穷、乡镇企业为何由相对繁荣转为相对衰落,海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赘述。

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当时被官方称为“盲流”的民工潮。本书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这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自下而上推动起来的,它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4亿。但究其实,它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民“走西口”、“闯关东”,中国南方农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续,是我的战友李明、我的同学赵启祥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的农

民子弟梦想和拼搏的延续。

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是“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是为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于伦敦

目录

- 1 | 序言
- 1 |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中国城市化走势图
——胡鞍钢访谈 / 8
- 13 |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
- 21 | 第三章
流动中的中国农民
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中的农民工
——周春山访谈 / 28
- 33 |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
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葛剑雄访谈 / 41
农民工的零点调查
——袁岳访谈 / 46
- 51 | 第五章
“特”不起来的特区

“刘易斯转折点”来临

——蔡昉访谈 / 57

本地人和外地人

——金城访谈 / 63

71 |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

城市化反思

——温铁军访谈 / 78

89 |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

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

——曹锦清访谈 / 96

历史地看待中国城市化

——彭希哲访谈 / 107

115 |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

我赞成农民就地城镇化

——茅于軾访谈 / 121

农民工成就城市化

——刘开明访谈 / 127

131 | 第九章

农民“的哥”

出租车司机的酸甜苦辣

——一位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访谈 / 138

农民工政策在执行中变形

——宋洪远访谈 / 143

147 |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梦想

——邱启光访谈 / 154

从农家小子到京城老板

——彭雄兵访谈 / 162

171 | 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 176

185 |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

193 | 后记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人口迁徙潮

——“你看，这条路就是农民工生活的写照，街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大多数都是进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农民。”胡鞍钢兴奋地说，“瞧，他们叫卖的货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会造成废气污染的三轮车运到此地，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甚至没有办理暂住证，但他们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

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记这么写着:

“早晨六点多,睡不着,起床,步出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酒店,漫无目标地闲逛。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一条幅:‘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2007年5月,我在中国南北各地采访,为一套系列报道收集素材,以下是我的采访日记中的一些片断记录——

海南三亚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头各处的三轮车便迅速汇拢,涌向客人:“去海滨转转吧,才一块钱!”“一块钱,拉你去吃海鲜!”南腔北调,但肯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没有地道的海南话。

“三亚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来了：外地游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辽宁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那三亚本地人都哪里去了呢？”我问。

这位司机笑着说：“他们都在广州、深圳打工呢……”

广州新白云机场

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经在河南住过几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问。

“不错，我是从周口农村出来的。”他爽快地承认。

我们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绍广州“的士行业”的“线路”：“广州本地人开出租的差不多了，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最多，其次是我们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像湛江、汕头……”

东莞东城区凤岗镇的长途汽车上

满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南腔北调，但好像没有东莞本地口音。

与邻座女孩聊起来，她在凤岗镇打工。五一黄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现在坐车赶回凤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经过许多镇，都是东莞辖镇，工厂遍布，酒店林立，商业街喧嚣缤纷，比中国北方某些中小城市还热闹。不断有人下车。邻座女孩说，下车的人中，也有她的同乡，都是从老家赶回工厂上班的。

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区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摩登城市中，还有这么一块“都市中的村庄”，而且就在离我酒店几步之遥的地方。街道狭窄，似

乎只能容下两个人并排通过,但街道两旁的店铺生意极旺,店铺之上,此楼住户与破楼住户的主妇们,完全可以打开窗户聊天,再顺便送给对方一瓶辣酱、一把葱……

于是,白天采访之余,这座城中村便成了我晚上吃夜宵、散步、聊天的好去处。有趣的是,这里的住户都是外地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因为租金便宜;房东则是本地的前农民,但早已变成完全靠房租为生的食利市民,他们都在“村”头的游艺室里喝茶、搓麻将呢。

据说,这里原来确实是农村,真正的农村,当深圳城区扩展的隆隆脚步迈到这里时,却被索价极高的农民挡住了,讨价还价谈不拢,农民便各自在自家私宅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十层左右的小楼,当起了“甩手”房东……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在学校采访完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四学生,我走出校门,来到对面小吃摊,买碗馄饨。老板和伙计都来自四川农村。

吃完馄饨,看看手表:距下一个采访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便走到附近一家发廊剪发。与理发的师傅聊起来,发现他的安徽乡音很重。

结束采访,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在上海打工的四川农民特别多,导致超市的四川辣酱脱销……

2007年的5月23日,其实并非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而言,也对我们这个星球而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约18万乡下人涌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乡人口平衡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城市这一边的那十几万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头所见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国农民?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美国作家布罗诺斯基曾在《科学进化史》一书中说过:“人类攀升进程中最大的一步,是从游牧生活转向村落农业的变化。”不过,由于年代久远,那一巨变的“拐点日”已经无从查考。但无人否认,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据可查的另一个历史巨变“拐点日”。如果说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迁居变定居,那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变过程大概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定居变迁居。

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并非都在同一天走过城市化进程的“拐点”。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它在1851年走过了这一“拐点”;美国则在1910年代末期跨过了城市化进程的“分水岭”;尽管带领全球走过这一“拐点”的那十几万进城农民很可能包括了许多中国“农民工”,但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约43%。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增速,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二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把采访胡鞍钢的日子约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后来翻阅自己的采访日记时,才发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坐落于北京海淀区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态楼中,胡鞍钢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显出一种难以理解的兴奋:“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我对胡鞍钢讲了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胡鞍钢笑了:“你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几朵浪花,这一人口迁徙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胡鞍钢的思维和语言跳跃速度极快:“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

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一消息是几天以后才宣布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奏折派学者”胡鞍钢。无论从长相、举止、气质或神态来看,胡鞍钢都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也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更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做手势,不停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走动,一会儿抛给我一份他主持写作的国情报告,一会儿带我到他的电脑旁,向我展示中国城市化的数据或曲线图,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哗”的一下把窗帘拉开——